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重释“信、达、雅”

——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王宏志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重释“信、达、雅”

——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王宏志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将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结合,综述与个案研究结合,对20世纪中国翻译理论做了系统梳理,论述了严复、梁启超、鲁迅、梁实秋、瞿秋白等近代翻译家的翻译思想与实践,有助于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翻译史和思想文化史。本书材料翔实,论述缜密,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学术规范。

本书读者对象: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高校师生和对思想文化史感兴趣的读者。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501256678 13801310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王宏志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5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

ISBN 978-7-302-14780-0

I. 重… II. 王… III. 翻译—语言学史—中国—20世纪 IV. 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7607号

责任编辑:屈海燕

封面设计:常雪影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孟凡玉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com.cn>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社总机:010-62770175

投稿咨询:010-62772015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邮购热线:010-62786544

客户服务:010-62776969

印装者:清华大学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40×203 印 张:10.125 字 数:233千字

版 次:2007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29.80元

本书如存在文字不清、漏印、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部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62770177 转 3103 产品编号:024308-01

翻译活动对人类社会发所起到的重大作用已是学界之共识。仅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翻译活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性的形成。近代一些思想家，如严复、林纾、梁启超、鲁迅等，无不以翻译为利器，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改造文学，改造语言。

然而，中国的翻译研究很长一段时期大多停留在语言分析层面，在国际上相对滞后。20世纪90年代前，有关翻译研究的论文主要探讨翻译技巧，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更宽阔的视野来研究翻译的学术论文寥若晨星。曾经一时，人们谈中国译论，必言“信、达、雅”，谈论西方译论，离不开奈达与功能对等。90年代后，大量西方的翻译理论被译介到中国，语言学派、功能学派、诠释学派、结构学派、文化学派等等，这些理论大大推动了中国翻译研究与国际接轨。新世纪初，全球化给中国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国的翻译研究方向博士、硕士研究生数以千计，一批翻译系、所或翻译研究中心在高校成立，西方翻译学术名著得到大量引进，翻译研究著作得到大量出版，两岸三地的翻译学刊增至十种之多，有关翻译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昌盛。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决定选编“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旨在结集出版近年来海内外有关翻译或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入选作品要求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有较强的原

创性和鲜明的特色,史料或语料翔实,研究方法具有可操作性,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揭示翻译的本质。本丛书所收著作须经丛书编委评审通过。我们期望这套书的编选和出版能够为打造学术精品、推动我国翻译与跨学科的发展而起到积极、实际的作用。

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

《翻译与跨学科学术研究丛书》编委会

丛书策划：宫 力 罗选民

主 编：罗选民

编 委：

Charles A. Laughlin [美]耶鲁大学

Perry Link [美]普林斯顿大学

隽雪艳 清华大学

李爽学 台湾中研院文哲所

刘树森 北京大学

孙艺风 香港岭南大学

王宏志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谢少波 [加]卡尔格雷大学

张珮瑶 香港浸会大学

目录

重释“信、达、雅”——20 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绪论

——关于 20 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1

重释“信、达、雅”

——论严复的翻译理论

87

“专欲发表区区政见”

——梁启超和晚清政治小说的翻译及创作

121

“暴力的行为”

——晚清翻译外国小说的行为及模式

159

民元前鲁迅的翻译活动

——兼论晚清的意译风尚

197

能够“容忍多少的不顺”

——论鲁迅的“硬译”理论

235

翻译与阶级斗争

——论 1929 年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

257

“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

——瞿秋白翻译理论的中心思想

293

新版后记

313

绪 论

——关于 20 世纪中国翻译研究

要理解一个人的过去,一个人的身份,对翻译本身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翻译再不是精英知识分子的“游戏”,或是文学学术的注脚,它与整个地区(甚至整个世界)里每一个人的生命及生活息息相关。

—Edwin Gentzler (Gentzler 1993: 107)

尽管文化史家普遍承认翻译在国家文化的形式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描述层面上,这方面的研究却很少,这实在令人感到惊讶。

—Itamar Even-Zohar (Even-Zohar 1978: 117)

—

一般理解,翻译是为着沟通的需要而进行的^①。人们使用不同的语言或文字,无法进行沟通,便得借助翻译。在多民族的中国,翻译

^① 这种强调翻译与沟通关系的观点,在翻译理论中十分普遍,例如尤金·奈达(Eugene Nida)便时常说到“翻译就是沟通”(“Translating Means Communicating”)(参 Nida & Reybourn 1981; Jin & Nida 1984: 31-50)。

很早便出现了,周朝已有专职翻译的官员^①,《礼记》中所记载的“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便得依赖翻译,当时有所谓“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陈福康 1992: 11),名字不一,指的都是翻译人员,当时做的主要是口译工作^②。以文字来做翻译的,最早应该开始于汉代的佛经翻译。换言之,文字翻译在中国,已有近 2000 年的历史了。

由于“沟通”是翻译的主要目的,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要求,便是翻译必须能够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这看来很合理,否则翻译便无法达到沟通的要求。基于这个原因,长久以来有关翻译的讨论,着重点都放在原文。这样一种对翻译的理解可以称为“原著中心论”(Source-text oriented)。简单来说,这种理论把翻译视为原文的重现,翻译的好坏,在于它跟原文有多相似,相似的便是好翻译,不相似的便一定是坏翻译^③。这样的翻译观,起码要待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西方翻译理论界才开始出现全面的质疑^④;而中国的翻译界似乎

① 《册府元龟》“外臣部”记有周公期间,有“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之说(陈福康 1992:10)。

② 正如罗新璋指出,“当时中原文化高于边陲民族,所以通达志欲只限于言语的沟通”,也就是口译(罗新璋 1984:1)。由于这个缘故,古时又把译者称为“舌人”。

③ Gideon Toury 曾为这种“原著中心论”(Source-text oriented)的翻译方法下定义:“They consider transla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ts being a reconstruction-in-general a maximal (or at least optimal) reconstruction-of ST (i. e., the formalization of ST's systemic relationships), or even of SL, in TL, in such a way and to such an extent that TT and ST are interchangeable according to some preconceived definition of this interchangeability.”(Toury 1981:9)。

④ 例如在一个 1976 年召开的翻译研讨会上,有人仍说“翻译理论家一致同意翻译在相关的方面跟原文‘对应’或‘相配合’”(Broeck 1978:29)。

至今大体上仍然以原著作作为重点,并不多见在这问题上作反思^①。结果,几乎所有的翻译研究,都只是围绕着一个老问题:究竟怎样才能把原文的意义准确地交代出来?这涉及的是翻译方法上的探究。

在翻译方法的问题上,最早而且也是最多人讨论的是所谓“意译”与“直译”的问题。在中国,意译和直译的争论,早在佛经翻译中便出现了。梁启超说:“直译意译两派,自汉代已对峙焉可耳”(梁启超 1984:58)。东晋道安“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道安 1984b:26),是“直译”的主张;他所批判的“五失本”,指的是人们对原著的删改(道安 1984a:24)。另一方面,六朝的鸠摩罗什据说曾猛然抨击了直译法:“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鸠摩罗什 1984:32)。可是,到了 20 世纪,还不断有人在争论直译与意译的问题,最著名的应算是鲁迅与梁实秋的论争,当时还出现了,“硬译”、“死译”、“歪译”、“乱译”等不同的说法。像鲁迅和梁实秋这样博学多才、经验丰富的大家,似乎也不能解决这翻译上的基本问题,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沮丧。

表面看来,“直译”和“意译”都是翻译的方法,但其实,所有有关翻译方法的讨论,涉及的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翻译的标准,也就是说,译者以怎样的方法翻译出来的作品,才算是准确地把原文的意义交代出来?即以“直译”和“意译”为例,所争论的是究竟可以容许译者有多大的自由度,译文跟原文能有多大的差异。这始终是翻译标

^① 举例说,香港中文大学在 1996 年 4 月 1 日至 3 日举办的一次“翻译学术会议——外文中文译研究与探讨”的研究会,参加者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地区,会议上所宣读的论文,几乎全部都是以原著为中心的(金圣华 1998)。

准的问题。“直译”与“意译”以外,我们还见到人们在过去提出过各式各样的翻译标准。影响最大的当推严复的“信、达、雅”(严复 1898:1321),郁达夫称之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郁达夫 1924:390)。另外,不少人也非常推崇傅雷“不在形似而在神似”的标准(傅雷 1951b:558),还有钱钟书所说的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的“化”(钱钟书 1984:696)、林语堂所说的“忠实、通顺、美”(林语堂 1984:417)等等,不一而足,眼花缭乱。但这现象令人不无疑惑:为什么经过了千百年来讨论,对于翻译的标准,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或比较圆满的答案?

本文不打算详细评论每一种“标准”的优劣,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不认为分析翻译标准的优劣,会对翻译作为一种学术科目作出什么建设性的贡献,具体的原因会在下文有所交代。在这里,首先要提出一个可说是基本的问题,以供思考:提出一个“标准”,目的原是在指出一个具体的准则,供译者参照及遵循;可是,这许许多多的“标准”,究竟具体地指出了什么?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征,在于以印象式、抽象性的字眼来对文学作品或现象作描述,这是传统读书人作为社会上一个特殊阶级所建构的一种特殊沟通话语模式^①。19 世纪末以来中国的翻译家,很多都是传统的读书人,念的是传统中国文学。他们熟习了这样的一套论述模式,提出的翻译标准也就跟传统文学批评的术语很相近。严复的“信、达、雅”,不用多说,他征引以解释这三个词的是《易经》和《论语》中的语句(严复 1897:1322),不少人曾经撰文尝试去分

^① 黄维梁便曾经讨论过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的“印象式批评”(黄维梁 1977: 1-26)。

析它的意思,分歧很不小;就是“形似”、“神似”、“化”等字眼,其实都是从传统文学批评中转化过来的,它们究竟真的能让我们清楚知道翻译的“标准”么?更不要说所谓的翻译的“神韵”^①之类玄虚的字眼了。当今天的翻译批评家轻易地套用这些传统印象式批评术语时,有没有可能具体一点地说出什么叫“形似”、什么叫“神似”?它们的实质分界在哪里?怎样的翻译者算得上是“神似”,才算得上是“化”?就是“直译”和“意译”也有同样的问题,什么程度的“忠实”才算得上是“直译”?怎样的翻译是“意译”?是不是每篇翻译都要分析它用的是直译或意译的手法?如果我们能够很容易便分辨出“直译”和“意译”,为什么这些争论会无休无止?一连串的问题,都是这些所谓“标准”的东西所引发出来的。看来,一个又一个的“标准”不但没有能为我们解决疑难,却带来了更多的麻烦。

当然,不是说人们完全没有指出一些比较具体的概念或方法。钱钟书便曾解释过“化境”的意思:

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钱钟书 1984:696)

这看来是指出了一个具体的路向,但同样引来一大串的疑问:怎样才算没有“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什么叫做“风味”?怎样才算“完全”保存了原有的“风味”?为什么翻译不能“生硬牵强”?为什么翻译要“保存原有的风味”?为什么“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就“算得”入于化境?为什么

① 例如:王以铸 1984:567-571。

不把这样的翻译称为别的——例如“神似的”、“信、达、雅”兼备的——翻译？同样的，傅雷在提出“神似”的观点时，也曾做过说明：“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傅雷 1984a:559）。可是，我们又不禁要问，假如傅雷以这样的“标准”来翻译《高老头》，会不会变成傅雷套用了《高老头》的故事来写出一篇中文小说？而且，在另一篇文章里，傅雷自己又说过这样的话：

方言中最 colloquial 的成分是方言的生命与灵魂，用在译文中，正好把原文的地方性完全抹煞，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岂不笑话！（傅雷 1951a:547）

虽然傅雷在这里原来是要批判白话文的贫乏，但“把外国人变了中国人”，不正是他原来的翻译要求：“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吗？况且，要确定怎样才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也有具体的困难。巴尔扎克的“中文写作”会是怎样的？跟莎士比亚的“中文写作”怎么比？我们何从可以知道？结果还不是傅雷的中文写作、或是梁实秋、朱生豪的写作？不要说这些外国作家的“中文写作”没法把握，就是我们自己是否真的已有“标准”的白话文，实在也成疑问。瞿秋白早在 1930 年代便说过有所谓“绝对的白话”（瞿秋白 1931:507），除了当时已遭反驳外（茅盾 1932:109-118），就是到了 50 年代，傅雷仍然说“我们现在所用的，即是一种非南非北，亦南亦北的杂种语言”。另外，傅雷又说过“老舍在国内是唯一采用西洋长句而仍不失为中文的唯一的作家”（傅雷 1984b:547-548），这点很多人都会赞同；可是，余光中便曾经在一次翻译研讨会中批评了老舍用上了太多的“的”

字,不像中文^①。那么,究竟是傅雷说得对还是余光中说得对?我们应该采用余光中式的中文还是傅雷式^②的中文?还是用别的翻译大家的“x y z式”中文?当人们斥责这个翻译不像中文,那个翻译过于欧化的时候,他们的权威来自哪里?我们是不是要求每一位译者都只能以同一模样的“中文”来翻译作品?如果真的是这样,阅读翻译作品还有趣味吗?作者或译者的个人风格哪里去了?“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又从何谈起?早从“五四”开始,便不断有人倡议,要建立中国现代白话,必须吸收各方面的养分(胡适 1935:25);就是在 1950 年代出现的“汉语规范化”运动及讨论,也从没有要求只能容忍一两“种”中文书写模式,而是鼓吹要多吸收方言及外来因素来丰富现代汉语。一些被认为“生硬牵强”的中文,不也可能是丰富现代汉语的元素?

除了这些比较抽象的概念性论述外,很多人都企图开列一些具体的方法来指导翻译。《中国翻译》里很多的文章,以及各种各样的翻译教程,性质上就是属于这一类。它们尝试分析中外文语法和句式上的差异,指出可能的翻译方法,例如英文的被动句怎样处理、长句怎样拆解,中英量词、拟声词、颜色词等异同,翻译过程中的增加或

① 余光中 1998:9。余光中是当次翻译研讨会的“专题演讲嘉宾”,他除了批评老舍外,还在文中批评了钱钟书、何其芳、徐志摩等。不过,当场已有人指出他对老舍的批评是有问题的,完全忽略了作者风格的问题。另外,金圣华在《主编序言》中,评论余光中的论文,大加赞叹之余,却又有这样的一句:“极度的纯净主义,与全盘的接受主义,同样不合时宜”,似有言外之音(金圣华 1998:xi)。

② 应该说明,这里所说“傅雷式”的中文,只是借用来说明所谓语文的权威问题。傅雷并没有要求人们以他的中文作典范。不过,确有不少人在修整别人的中文时,是以一种权威的姿态出现,就好像每一个人非用这种模式的中文不可似的。这样的态度经常出现在讨论翻译的文章里,甚至前面征引的余光中的文章里,也隐含着这样的姿态。

删减手法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否认,这些“指南式”或“教程式”的翻译讨论,对初学翻译的人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不能完全抹杀,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同意,这些不能算是“翻译研究”,原因是它们并没有把翻译当做一门专门学术学科来进行研究^①,充其量只不过是有关翻译技巧的讨论,而更多的时候是被归纳在“外语教学”的范围内——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情形也大都一样),翻译都是外语系教授的工作。因此,这一类的翻译教程,对于提高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并没有多大帮助。

另一种也很常见的讨论,是一些翻译工作者侃侃而谈他们过去的翻译经验,他们怎样地去翻译某本世界经典名著,怎样地披荆斩棘、艰苦经营,最后怎样成功地解决所有的翻译难题。不是说要完全抹杀这些“经验”,学问往往是从累积的经验中得来的。不过,正如文艺作家大都不是文艺学科方面的学者一样,我们也不能把翻译经验等同于翻译研究。有学者说过这样的话:

讨论翻译的文字很多,但要从中筛选一些理论性的部分,却显得十分贫乏,原因在于这些讨论就好像是来自翻译工作坊似的。个人的轶事和点滴的意见,是会有点功用的,但肯定不是翻译所要求的完整而一致的理论。(Graham 1981:23)

① 在一些传统的“翻译研究”中,也有人把这些教材式的讨论,视为“翻译研究”的一种。例如王克非便说过,“一般”的翻译研究,是包括“翻译技巧”的,主要是分析汉外各种语言的异同,探讨翻译中的理解和表达,包括对译品的评析(王克非 1997:3)。另外,谢天振也指出过,“传统”的“翻译研究”有属于外语教学范畴的一类。“旨在探讨外语的理解与表达,如对英语中某些特殊句型如何理解、如何译成中文的讨论或是研究翻译的技巧,诸如外译中时长句的处理,某些外语结构的汉译分析,某些译作和译家的翻译成就等”(谢天振 1994:160)。

不要说建立什么的翻译理论,就是要帮助确立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轶事趣闻和琐碎零乱的经验谈显然是不足够的。

同样不能提高翻译研究的学科地位的是一些所谓的译文评介。本来,译文评介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可以让人深入探讨一些重要的翻译问题。但令人感到可惜的是,我们目前见到大部分的译文评介,不外乎两种:一是一些空泛的赞赏,二是集中讨论译文的错译。所谓“空泛的赞赏”,是指从一些非常一般性的字眼,诸如内容忠实、行文流畅等来讨论译文,并没有具体地评述译文的特点。虽然,这些翻译“讨论”有时候会出现在学报或学术研讨会上,但它们主要的功用在于互相标榜吹捧,并无实际的学术价值,大可置之不理。至于第二种译文评介,不是说不应该指摘错译、乱译,但假如这些错误只是因为译者的水平低劣,而有关的讨论也仅止于指出一些显而易见的现象,而没有进一步去尝试探索或触碰更核心的翻译问题,诸如为什么低劣的译者仍然能够进行翻译,又或是讨论这些低劣的译文在译入语文化中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却明显是不够的。举例说,刘靖之曾对林以亮的一篇文章做过统计,颇为惊讶于里面出现了“大、小译例 32 个之多!”(刘靖之 1981:13)不过,细看文章,即不难发觉,林以亮所指出的一些翻译谬误,大多是跟翻译本身没有直接关系的,例如他批评了哈脱(Henry Hart)把“沧洲”误作“沧州”、小畑熏良把“扬州”误作“杨州”,又或是把电影片名 *White Night* 翻译成“白夜”——是不知道它源自法文,作“失眠之夜”、“不眠之夜”解等,无疑都是正确的,也很能显示出林以亮的学力深湛,但其中的功用,除了说明翻译是陷阱重重,译者必须十分小心外,对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会有什么积极的贡献?严格来说,这些例子可以说跟翻译无关,问题在于译者理解原文的能力。译者即使不把诗句或电影片名翻译出来,他们的阅读

本身就是错误的^①。此外,即使我们能够找到一些真是出于翻译的错误又怎样?每天批改学生的翻译习作,形形色色的错误多得不得了,把这些错误译句东张西罗,抄录搜集,就算得上是“翻译研究”吗?它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别的方向去研究错误的翻译? Susan Bassnett 在她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的再版前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指导性”的翻译讨论只能在课堂上发挥实际的功用:

我们讨论翻译时,不再说译者“应该”或“不应该”这样做。这种评价式的术语,只适用于教授语言的课堂上,那里的翻译,只有一个非常明确、狭小的教学用途。(Bassnett 1991: XVIII)

过去有关翻译的讨论,的确是太多“应该”或“不应该”做这做那的指示了,除了教导初学者外,这样的路向是不可能把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建立起来的。

二

尽管过去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标准,而提出不同标准的人又往往发生激烈争论,就好像彼此之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势不两立似的,不过,在本质上,他们的思维模式其实是相同的,就是全都认定原著是判定翻译的权威力量。他们所谓的“标准”,就是把译文跟

^① 必须指出,虽然我并不认为林以亮以这个方向去讨论翻译是属于“翻译研究”的范围,但如果从他自己所选定的讨论方向来看,这毫无疑问是一篇水平很高的文章,里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比起其他很多低劣的“评论”,确实是优越得多。这也是我在这里选它作为讨论对象的原因。